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究（五）

论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发展模式的形成机制

——以“投资于人”驱动经济结构再平衡

黄群慧[1,2]　彭　冲[3]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2445；
3. 重庆大学 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十五五”规划针对我国面临的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宏观经济治理思路。文本区分内需主导、消费拉动与内生增长对应的市场依托、需求结构和增长源泉三个维度，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协同框架下，以“投资于人”为主线，构建“投资于人—人力资本与收入提升—消费扩张升级—需求引致创新—生产率提高—再投资于人”的反馈闭环，同时，阐明高质量物质资本在能力形成、就业承接和创新应用中的支撑作用。研究认为，当前推动经济结构再平衡的重点在于提高“投资于人”的相对重要性和有效性；发展型服务消费具有生产性，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时间释放、知识溢出和数据要素沉淀进入内生增长机制。进言之，内生增长闭环能否成立取决于财政可持续性、收入分配和制度激励结构。从政策层面看，要推动财政支出结构、公共服务、收入分配、服务消费供给、区域联动和制度配套协同改革，为内需主导型内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关键词：投资于人；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内需主导；消费的生产性；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26）05-0042-14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924.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科技竞争加剧，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将发展立足点置于国内，依托强大的内需市场牵引供给创新，破解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是我国抵御外部冲击、提升经济体系韧性的根本支撑。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铁公基”等传统物质资本投资和出口拉动。这一模式在工业化加速阶段释放巨大增长动能，随着要素禀赋变化和后工业化阶段的到来，传统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结构失衡风险持续加剧。如何通过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破解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动态平衡，是“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核心命题[①]。

收稿日期：2026-09-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24&ZD03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促进服务消费及支持相关产业发展研究”（25AZD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通讯作者：彭冲，重庆大学管理科学与房地产学院教授。

① 刘志彪，孙文婷. 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 南京社会科学，2025(9)：30-4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下简称新发展模式）的战略部署，实质是通过投资结构与增长机制的协同调整推动发展模式实现结构性转型。其中，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重要原则[①]。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在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框架下，消费如何从短期需求变量转化为长期增长动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作用机制存在哪些差异？第二，基于中国发展阶段转换的现实背景，投资结构为何必须从偏重“物”的扩张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第三，在政策操作层面，如何通过财政安排、公共服务优化、收入分配调节、服务消费供给完善和制度配套等实现“投资于人—消费升级—创新增长”闭环的有效运转？

相较既有研究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同于既有研究多从财政资金或居民消费效应孤立考察“投资于人”的经济社会效应，本文将其嵌入破解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推进结构再平衡与发展模式转换的整体进程，论证其不仅是民生政策的发展，更是增长机制的重构。第二，突破“投资于人—消费”的单向传导视角，本文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框架下构建以“投资于人”为主线的“投资于人—人力资本与收入提升—消费升级—需求引致创新—生产率提升—再投资于人”闭环机制，为新发展模式提供可解释的实现路径。第三，本文强调该闭环并非自动实现，其运转受收入分配、财政可持续性和央地激励结构等多重约束，进而将“投资于人”的政策讨论从工具层面拓展至增长条件与制度条件层面。

一、问题的提出：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突出

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针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作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一核心判断。从整体看，“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彰显，实力稳步提升。202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 140 万亿元，但供给增长与需求恢复仍不平衡。生产端增势较为强劲，2025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9%，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4%[②]；需求端表现明显偏弱，2025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 3.8%；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9476 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4%，较上年回落 0.7 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全年涨幅为 0%，月度涨幅连续 34 个月低于 1%[③]。2026 年，受产业升级、季节性需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影响，部分价格指标温和回升，但尚不足以表明供需结构性矛盾得到根本性缓解。

我国的供强需弱矛盾既受国际环境变化影响，又与国内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交织有关。简言之，我国在基本实现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如何在巩固供给优势的同时扩大有效需求，并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增长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④]。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1978 年—2025 年，我国经济总量累计实际增长 5125%，年均增长 8.78%[⑤]，但经济增长模式仍受发展阶段、要素禀赋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约束。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技术进步既定条件下，资本持续积累终将面临边际收益递减；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增长更加依赖知

① 黄群慧. 以“投资于人”推动“十五五”经济新供需平衡[J]. 东南学术，2026(1)：39-45.

② 2025 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增长 12.5%[EB/OL]. [2026-08-30].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8/t20260827_1965129.html.

③ 国家统计局：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1575 元 同比实际增长 4.7%[EB/OL]. [2026-08-02]. https://www.cls.cn/detail/2174133.

④ 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2021，56(4)：4-23.

⑤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以 1978 年的价格进行平减后得到的实际数值。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识积累、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能力增强[①②]。虽然投资驱动在经济发展初期具有合理性，但伴随资源约束和发展阶段转换，单纯依赖资本数量扩张的空间将持续收窄。从国际经验看，增长动力转换通常发生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均 GDP 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2015 年前后，我国已经接近日本、韩国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发展水平[③]。现代增长分析表明，需求因素对长期增长具有约束作用[④]。在这一阶段，居民消费不仅仅是增长结果的分配，更通过市场规模、需求结构和消费偏好影响企业创新方向和产业演化路径。因此，理解中国经济为何必须从偏重传统投资扩张转向消费与有效投资协调的内需主导，是把握发展阶段增长机制的起点。

（一）工业化阶段的投资驱动增长及其历史贡献

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赶超通常需要经历资本快速积累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资本匮乏、基础设施薄弱和产业基础不足等约束。在此背景下，集中资源推进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既能够改善生产条件，又可以通过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加快工业化进程，此时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工业化扩张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红利得到充分释放。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投资 – 生产 – 出口”相互支撑，形成资本积累、劳动力供给和外部需求扩张互相强化的增长闭环，共同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从宏观表现看，长期以来的资本形成总额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2025 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约占 GDP 的 40%，美国、日本、德国和欧盟的占比稳定在 20%~25% 区间[⑤]。较高的国民储蓄率为投资扩张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使我国在较短时期内完成诸多发达国家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并非否定投资驱动的历史贡献，而是强调工业化阶段积累的物质基础、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网络为中国经济迈向内需主导阶段创造条件。

（二）传统投资驱动模式面临的现实约束

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传统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持续递减。我国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主要表现为传统基建、房地产和部分制造业投资回报空间收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我国基础设施总体水平大幅提升，同类项目继续大规模扩张带来的新增产出和社会收益明显减少。2008 年以来，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基础设施利用率不足、投资回报下滑和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新城新区建设在短期拉动投资的同时留下土地利用效率不高与债务负担[⑥]，这一问题在人口流出地和中西部地区较为突出。

更为重要的是，脱离需求与收入增长的投资扩张易造成“供给扩张快，需求跟不上”的结构性矛盾。过去较长时期内，高投资率推动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快速扩张，但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能力未同步跟进[⑦]。这一矛盾在当前集中表现为居民需求转向服务消费，投资和资源更多流向制造业[⑧]，不仅加剧制造业产能过剩，而且削弱了投资向居民收入和可持续消费能力转化的效果。同时，依靠房地产和土地财政驱动模式难以为继。房地产投资在稳增长、促就业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结构调整、住房需求结构变化以及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2025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7.2%[⑨]，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土地出让收入下降表明依靠空

① Romer P M.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8(1): 3-22.
②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③ 黄群慧. 以“投资于人”推动“十五五”经济新供需平衡[J]. 东南学术, 2026(1): 39-45.
④ 郭克莎, 杨阔.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J]. 经济研究, 2017, 52(10): 4-20.
⑤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⑥ 彭冲, 陆铭. 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J]. 管理世界, 2019, 35(8): 44-57.
⑦ 吴敬琏, 杨长福, 朱铁臻, 等. 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J]. 经济研究, 1983(5): 28-36.
⑧ 刘志彪, 孙文婷. 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9): 30-40.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OL]. [2026-08-28].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间扩张和土地开发的传统路径正在接近边界。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减弱进一步压缩投资驱动模式的增长空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老龄化加速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使单纯依靠要素投入推动增长乏力。未来增长不仅需要提高投资效率，更需要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创新能力增强。从整体看，中国经济已经从资本短缺时代进入需求约束和创新约束并存的新阶段，增长中的主要矛盾由供给不足转向供需结构不匹配。

（三）后工业化阶段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持续攀升

中国总体上已基本步入后工业化阶段，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需求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服务消费占比持续上升。2025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1.39万美元[①]，接近国际经验中消费从以商品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的关键节点。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养老等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4.5%，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46.1%，服务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务消费占比提升的同时，居民消费呈现品质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特征。消费结构变化不仅改变了居民消费的最终需求，而且将重塑企业投资方向、技术选择和产业组织方式。在工业化阶段，供给能力扩张发挥主导作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消费者需求日益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企业竞争从成本和规模比拼转向产品、服务和场景创新。需求结构变化重塑资源配置方向和产业演化路径，与需求引致创新理论相吻合。大国本土需求能够成为后发国家创新的重要优势来源[③④]。扩大内需的关键不在于单纯扩大消费规模，而是以需求升级牵引供给升级。对于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经济体而言，居民消费偏好和需求变化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四）外部环境变化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一步强化内需战略的重要性

除发展阶段转换外，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内需主导更为紧迫。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增多，依赖外部市场的发展模式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将发展立足点更多转向国内市场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内在要求。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生产和消费方式，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的加快应用，不仅催生数字消费、人工智能消费和健康消费等新场景，而且改变了企业获取需求信息、组织生产和开展创新的方式。对技术创新而言，超大规模本土市场既能够提供庞大的消费体量，又可以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快速迭代空间。大规模需求能够降低创新试错成本、加快技术扩散、提高创新收益预期，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内需主导不是对外开放的替代，而是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础。稳定、庞大且持续升级的国内市场能够增强我国对全球资源、技术和要素的吸引力，在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同时提升经济体系韧性。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 14 亿多人口的国家而言，将超大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市场规模优势、创新优势和增长优势，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五）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发展模式的内涵

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阶段后，偏重传统物质资本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增长空间持续收窄。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正在成为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成为推动创新的基础。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非短期刺激政策，而是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其核心不在于简单扩大消费总量，而是强调推动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资本扩张逐步转向依靠居民需求升级、技术创新进步和生产率持续提升。理解这一模式，需要区分三者的分析维度，厘清其内在联系与非必然等价关系。

内需主导回答增长主要依托何种市场，属于需求来源维度。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内需主导既可能表现为投资拉动，也可能表现为消费拉动，关键在于将发展立足点更多置于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驱动国内国际双循环。

①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左右时，消费需求会逐步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③ 易先忠，江宇迪，孙思意. 后发大国如何创新：本土需求的作用及实现[J]. 中国软科学，2022(S1)：13-24.

④ 易先忠，潘锐. 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强化效应：科技强国建设的优势途径[J]. 财贸经济，2023，44(11)：137-15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消费拉动回答内需主要通过何种需求结构发挥作用，属于最终需求构成与传导维度。其强调增强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消费的生产性功能。与一般意义上的扩大消费不同，消费拉动不仅强调提高消费规模和消费占比，而且致力于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教育、医疗、文化、旅游、养老等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品质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特征，这种需求变化牵引企业改进产品、创新服务、拓展场景，推动产业结构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内生增长回答持续增长动力如何形成，属于增长源泉维度。其核心在于知识、技术与人力资本积累由经济主体的研发、学习、投资和制度激励内生决定，而非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内生增长既可能受消费需求牵引，也可能源自供给端原始创新。在内需主导和消费拉动条件下，超大规模市场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稳定的收益预期，消费升级能够不断提供新的产品、服务和场景需求，推动创新活动深度嵌入经济循环。教育、医疗消费等生产性服务消费转化为人力资本，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只有当内需主导提供市场基础，消费拉动形成需求牵引，需求进一步转化为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提升时，才可能形成内生增长。如果说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和内生增长分别从市场依托、需求结构和增长源泉三个维度描绘了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目标形态，那么，经济结构再平衡则强调由传统增长模式走向这一目标形态的调整过程及结果。本文强调的经济结构再平衡不是简单提高消费率、压低投资率，也不是以“投资于人”取代“投资于物”，而是围绕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协同调整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投资结构，使居民消费与有效投资、人的发展与物质资本积累、需求牵引与供给创新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匹配。在这一过程中，“投资于人”是矫正既有结构偏向、畅通“收入—消费—创新”循环的重要路径，高质量“投资于物”和供给端原始创新为能力形成、就业承接和创新应用提供必要支撑。

三、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作用机制及边界

（一）内生增长的供需机制与两类投资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动力的认识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的演进。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给定，长期经济增长最终由外生的技术变迁决定；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强调创新、知识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①②]。沿着这一脉络，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被纳入经济增长机制的核心。理论模型显示，健康人力资本与教育人力资本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③]。由此可见，增长可持续性不仅源于物质资本积累，而且有赖于技术创新和人的能力提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需求与生产作用的分析视角。这一视角未将消费仅仅视为生产的终点，而是强调消费对生产的能动作用。有学者系统阐释了马克思关于“消费的生产性作用”，认为消费创造生产的主体、提升劳动者素质、构成生产的动力，为中国语境下“消费的生产性”研究奠定基础[④]。这些观点表明，需求侧并非被动适应供给，消费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传递需求信号和强化创新激励反作用于生产与投资，使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⑤]。内生增长既包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共同作用形成的供给能力提升机制，也包含消费扩张升级反作用于生产和创新的需求反馈机制。

基于上述供给能力积累与需求反馈相互作用的分析视角，笔者根据资源的主要投向，将发展性投入概括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两类。“投资于物”是对物质资本及其技术载体的投入，既包括传统基建、房地产，也包括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先进制造设备和绿色产业装备，其作用涵盖扩大产能、承载新技术、改善劳动条件与提高人力资本使用效率，等等。“投资于人”侧重健康、教育、技能等能力积累及其实现条件。同一项目通常包含这两类投入，例如，实训设备与技能培训、医疗设施与医护人才培养。“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优劣之分，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

① Romer P M.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8(1): 3-22.
②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3-42.
③ 王弟海. 健康、教育与内生经济增长[J]. 浙江社会科学, 2025(2): 20-37.
④ 杨圣明. 谈谈消费的“生产”作用[J]. 经济研究, 1979(12): 40-41.
⑤ 彭冲, 钟辉勇. 消费的生产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J]. 学术月刊, 2025, 57(2): 56-6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主要约束、边际收益和供需匹配状况确定投入重点，并通过相互协同形成持续增长动力。

（二）偏重传统物质资本扩张的逻辑及其局限

长期以来，我国通过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形成产能、改善要素条件、拉动短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以前，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长期保持在 2.5% 以上，2025 年拉动 GDP 增长 0.8 个百分点[①]。在资本稀缺、工业化加速阶段，投资驱动具有充分的历史合理性。但当投资在部分领域重复扩张、与人力资本和有效需求脱节时，其局限便逐渐显现。

一是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当物质资本相较人力资本和有效需求过度积累时，新增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趋于下降，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空间收窄[②]。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23 年末，我国第二、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 1439.1 万亿元，与当年 GDP 之比约为 11∶1，高于 2013 年的 8∶1[③]。二是路径依赖。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物质资本投资时，财政、金融资源会持续向“物”倾斜，形成自我强化的结构。在后工业化阶段，需求向服务业集中、供给与投资明显流向制造业，二者错配使投资难以转化为居民收入与消费，或将加剧产能过剩，使供强需弱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显性化。更深层的代价可追溯至特定的发展战略选择，早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过度资本深化，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劳动收入份额受到抑制，城乡消费差距随之扩大[④]。

（三）“投资于人”的内生逻辑

相较“投资于物”而言，“投资于人”的突出作用在于提升人的能力及其实现条件，并通过就业和收入联通供需两端。从理论层面看，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与知识积累是长期增长的内生源泉[⑤⑥]；人力资本理论将教育、健康和技能投入视为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与未来收入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发展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投资于人”在微观层面关乎个体能力与收入，在中观层面影响产业与就业结构，在宏观层面联通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制度层面依托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涵盖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⑦]。从宏观政策层面看，不能将“投资于人”简单等同于人力资本投资，而应将其理解为以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资源配置理念，涵盖基本保障、发展机会和能力建设，并由政府、企业和家庭共同参与。为聚焦增长机制，笔者主要考察其中能够通过能力、健康和技能积累进入生产与消费循环的投入。

在供给端，“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健康与教育水平积累人力资本，催生新的生产能力和创新供给。在需求端，“投资于人”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强社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释放被压抑的消费能力。这一需求侧传导机制在既有文献中已经获得实证支持。例如，具有“投资于人”性质的数字化教育对于弱势劳动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技能提升效应更加显著[⑧]；财政资金“投资于人”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促进居民就业带动居民消费增长[⑨]。由此可见，区别于单纯的需求刺激，“投资于人”不依赖一次性财政补贴促销，而是通过提升“人”的能力与收入，夯实可持续的消费能力和供给能力。

（四）“投资于人”驱动内生增长的闭环机制

从“投资于人”视域看，内生增长的关键在于消费与生产、创新之间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形成相互强化的逻辑闭环。笔者将其概括为三个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OL]. [2026-08-28].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② 王弟海. 健康、教育与内生经济增长[J]. 浙江社会科学，2025(2)：20-37.

③ 资产/GDP这一存量比率的上升可能受产业结构资本密集化、资产价格变动与统计口径调整影响，并不等同于严格意义的边际报酬递减。

④ 林毅夫，陈斌开.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消费不平等：来自中国的证据[J]. 浙江社会科学，2009(4)：10-16.

⑤ Romer P M.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8(1)：3-22.

⑥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22(1)：3-42.

⑦ 黄群慧，王岭. 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2025，45(9)：69-81.

⑧ 蔡宇涵，郑新业. 高等教育扩招政策与数字技能提升：基于“投资于人”的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6，43(3)：229-252.

⑨ 金殿臣，李媛，陈昕. 财政资金“投资于人”与居民消费：效应与机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5)：88-97.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制。第一，“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健康、教育、技能与就业能力，增强居民稳定收入与可持续消费能力。第二，发展型服务消费具有生产性，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时间释放、知识溢出和数据沉淀进入增长机制[①]。教育、医疗、文化、健康等消费在具有最终消费属性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投资效应。第三，消费升级通过市场规模效应、需求引致创新和供需匹配效率提升，推动产业升级与生产率提高，但这一机制受收入分配结构和制度激励约束。消费拉动内生增长不是“让居民多花钱”，而是让更多消费转化为能力积累、创新牵引和生产率提升。

生产性消费理论为理解教育、健康等支出的双重属性及其需求反应提供微观依据。有学者认为，生产性消费既能够带来当期效用，又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或收入能力影响消费者收入。因此，其有效成本并非单纯的货币价格，而是货币价格扣除边际收入贡献后形成的影子价格。随着生产性消费增加，边际生产率递减，影子价格相应上升；与此同时，生产性消费会提高消费者的完全收入。影子价格与完全收入内生变化的共同作用，使生产性消费需求对外生价格和收入变化的反应相较一般消费而言呈现较弱需求[②]。这一结论表明，生产性消费具有不同于普通消费的需求特征，单纯依靠价格下降或暂时性收入增加，其扩张效果可能受限。但上述研究未直接证明教育、健康消费具有宏观周期刚性，无法据此否定补贴和转移支付的作用。此类消费能否持续扩张，还取决于居民长期收入预期、公共服务供给、服务质量与可及性、融资约束以及人力资本回报等条件。将生产性消费假说嵌入内生增长模型，其结论是消费发挥生产性作用，但存在一定条件[③]。在低收入或分配失衡的初始条件下，生产性消费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式的多重均衡困境，与本文强调的收入分配约束相呼应——“消费的生产性”能否转化为正向增长取决于初始条件与分配结构。从具体类型看，教育支出具有显著的人力资本投资属性，但家庭的教育选择并不必然以实际教育增值为依据，因此，市场选择本身不必然保证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④]。从收入分配角度看，“有限需求”假设进一步指出，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会抑制市场总需求，使市场规模成为产业扩张和持续创新的约束[⑤]。因此，劳动者分享增长成果、形成稳定消费能力，是消费生产性转化为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进言之，消费升级能够牵引产业升级。既有研究认为，在中国式技术变迁背景下，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原发式技术进步能够全程有效促进这一“双升级”[⑥]。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可以通过引致创新带动生产率提升。有学者将非位似偏好引入创新驱动增长模型，揭示了收入分配如何经由市场规模与定价两条途径影响需求引致创新[⑦]。此外，中产群体壮大后通过消费结构升级，能够引导创新与产业向中高端攀升[⑧]。就我国国情而言，“需求引致创新”是后发大国创新的优势途径，大国本土需求本身具有引致创新的内在优势，产业数字化通过提升供需匹配度与研发效率，强化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效应[⑨]。由此可见，消费升级不仅会改变最终需求结构，更会通过企业预期、创新收益和市场规模重塑供给体系。

综上所述，笔者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框架下，将以“投资于人”为主线的反馈机制概括为：投资于人—人力资本提升与收入

① 彭冲，钟辉勇. 消费的生产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J]. 学术月刊，2025，57(2)：56-66.

② Suen Wing，Mo Pak Hung. Simple Analytics of Productive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102(2)：372-383.

③ Steger T M. Productive Consump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4(3)：365-375.

④ MacLeod W B，Urquiola M. Is Education Consumption or Investment?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Competition[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2019，11(1)：563-589.

⑤ 陈昆亭，周炎. 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20，36(4)：39-53.

⑥ 龙少波，丁露，余康. 中国式技术变迁下的产业与消费“双升级”互动机制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20(10)：71-84.

⑦ Foellmi R，Zweimüller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and-induced Innova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6，73(4)：941-960.

⑧ 高培勇，袁富华，胡怀国，等.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治理[J]. 经济研究，2020，55(4)：4-19.

⑨ 易先忠，潘锐. 产业数字化对本土需求引致创新的强化效应：科技强国建设的优势途径[J]. 财贸经济，2023，44(11)：137-15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增长—消费扩张与升级—引致创新、拉动产业升级—生产率提升—财政与企业盈余增加—进一步投资于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框架并非将消费等同于经济增长，而是强调只有当消费扩张转化为人力资本积累、创新激励和生产率提高时，才可能形成内生增长闭环。投资于人—收入—消费的若干传导环节已经获得实证支持[①②]；“消费引致创新”一环得到本土经验研究印证[③]；“生产率提高—盈余回流于人”的后续环节更加依赖制度安排。若新增资源主要流向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而未补足人的能力建设与必要配套，闭环可能被打破。这一闭环的成立取决于收入分配、财政结构和地方激励机制能否共同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五）“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再平衡

在上述经济结构再平衡中，“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协同调整构成投资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增加“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否定物质资本投资的必要性[④⑤]。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这一协同取向的政策表达。从宏观层面看，从“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观出发，优化投资结构本身即蕴含追求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含义[⑥]。用于物质资本积累的投资直接带来短期增长[⑦]，新型物质资本积累与用于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投资积累人力资本与生态资本，有利于长期发展。与此同时，消费与投资须维持合理比例。这为“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再平衡命题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方法论支撑，即“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再平衡不仅是短期的需求调节，更指向长期、全局、多维的高质量发展[⑧]。

可以在“投资—消费融合”理论框架下理解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有研究主张超越“投资驱动与消费驱动”二分法，将“就业岗位创造能力”作为连接投资与消费的中介变量，其构建的“投资—创造不同收入水平的就业岗位—消费”三环节联动机制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框架[⑨]。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高质量投资（尤其是高技术、资本密集与创新密集产业及其基础设施投资）在扩大投资需求的同时创造中高收入岗位，通过收入增长拉动消费扩张，形成良性循环。根据这一框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症结并非单纯的“消费不足”或“投资过剩”，而是创造中高收入岗位的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创造低收入岗位的传统产业的替代过程相对缓慢，加之初次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资—收入—消费”的转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区分的是资源的投向（投于“物”还是投于“人”），而非增长的驱动力（投资还是消费），二者不应等同。正因如此，二者恰可互补：当“投资于物”升级为创造中高收入岗位的高质量投资时，其在边际上正是经由就业与收入向“人”渗透，表明“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边界是连续而非对立的，上述思路与本文的协同再平衡相互印证[⑩⑪]。就增长体制而言，本文主张的“以收入与人力资本为枢纽”的增长同国际文献中的“工资主导型增长”（Wage-led Growth）存在相通之处[⑫]，但本文的落脚点在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

① 金殿臣，李媛，陈昕. 财政资金“投资于人”与居民消费：效应与机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5）：88-97.

② Chamon M D，Prasad E S.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0，2（1）：93-130.

③ 易先忠，江宇迪，孙思意. 后发大国如何创新：本土需求的作用及实现[J]. 中国软科学，2022（S1）：13-24.

④ 黄群慧，王岭. 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2025，45（9）：69-81.

⑤ 黄群慧. 以“投资于人”推动“十五五”经济新供需平衡[J]. 东南学术，2026（1）：39-45.

⑥ 陈昆亭，周炎. 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20，36（4）：39-53.

⑦ 吴敬琏，杨长福，朱铁臻，等. 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J]. 经济研究，1983（5）：28-36.

⑧ 陆铭. 面向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J]. 学术月刊，2022（3）：58-71.

⑨ 张杰. 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机制：基于“投资–消费”融合理论框架[J]. 学术月刊，2025，57（12）：36-49.

⑩ 同⑥

⑪ 张杰. 如何科学认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泉与改革突破口[J]. 学术月刊，2024，56（4）：103-114.

⑫ Bhaduri A，Marglin S.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14（4）：375-393.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生产性，而非单纯提高工资份额。

上述框架蕴含三个有待检验的判断：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可能削弱“投资于人”的需求传导效应，若新增收益不能有效转化为劳动收入与公共服务，闭环的消费传导将受到抑制；第二，服务可及性、技能与岗位匹配程度会影响“投资于人”的效果，但基础薄弱地区可能因补短板获得较高边际收益；第三，只有当“投资于物”以创造中高收入岗位为导向时，其对消费的拉动才可能显著为正。这些判断与既有研究发现方向一致[①②③]，但仍然需要更为严格的因果识别。

从可持续增长角度看，有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财富极化与供需结构矛盾是增长不可持续的根源，合理的分配结构与公有资本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④]。“投资于人”不仅是一项经济政策，更是兼顾效率与公平、连接增长与民生的发展战略。“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提供物质基础，“投资于人”为“投资于物”创造有效需求和高素质劳动力，二者动态平衡形成新发展模式的微观基础。

四、投资结构再平衡的阶段演进与实践表现

投资结构再平衡是随增长阶段演进逐步展开的过程。笔者从历史、现实与实践三个层面考察“投资于人”由理念转向政策的条件和表现。

（一）历史逻辑：从“投资于物”主导期到战略转向

1.1978 年—2008 年：“投资于物”主导期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阶段以及与其相匹配的战略选择决定了“投资于物”在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格局有其历史延续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导向深刻塑造了资本密集、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的结构。有研究显示，重工业优先战略使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⑤]。有数据显示，城乡收入比从 1985 年的 2.1 上升到 2006 年的 3.3，增幅超过 50%。这种特定的投资与分配格局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埋下居民消费相对不足的伏笔。从政策演进看，扩大内需的方针逐步确立。这一脉络从 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到 2025 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持续推进[⑥]，反映出党和政府对增长动力转换的认识不断深化。

2.2008 年—2015 年：边际报酬递减与结构失衡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规模投资在短期内有效对冲外需冲击，但也暴露出偏重传统项目扩张的结构性矛盾。传统基建和房地产相关投资对增长的边际拉动趋弱，高储蓄、低消费和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更加突出，增长并未充分转化为居民可持续消费能力。

具体而言，一是高储蓄、低消费的典型事实。居民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扭曲，而非单纯的居民偏好[⑦]。住房、教育、医疗等私人负担上升叠加金融发展不足，成为中国城镇家庭储蓄上升的重要原因[⑧]，印证了“市场扭曲而非偏好”的判断。二是传统需求拐点临近。城镇住房及部分耐用消费品需求由高速扩张逐步转向结构升级，依靠房地产和重化工业持续扩张

① 金殿臣，李媛，陈昕. 财政资金“投资于人”与居民消费：效应与机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5）：88-97.

② 陈昆亭，周炎. 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20，36（4）：39-53.

③ 张杰.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机制：基于“投资–消费”融合理论框架[J]. 学术月刊，2025，57（12）：36-49.

④ 周炎，陈昆亭，乔晓楠. 现代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逻辑：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J]. 南开经济研究，2023（9）：19-39.

⑤ 林毅夫，陈斌开.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城乡消费不平等：来自中国的证据[J]. 浙江社会科学，2009（4）：10-16.

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着力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J]. 党建，2025（12）：33-36.

⑦ 陈斌开，陈琳，谭安邦. 理解中国消费不足：基于文献的评述[J]. 世界经济，2014，37（7）：3-22.

⑧ Chamon M D，Prasad E S.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0，2（1）：93-13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拉动增长的空间持续收窄[①]。三是增速换挡。中国 GDP 增速从 2010 年的 10.6% 降至 2016 年的 6.7%，下降 3.9 个百分点；2012 年—2015 年，我国 16~59 岁劳动年龄人口累计减少约 1300 万人，人口红利开始消退[②]。上述事实表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扩大投资规模，而是重塑投资结构与收入转化机制。

3.2015 年至今：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投资于人”战略转向

面对结构失衡，我国政策改革经历了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供需协同、再到“投资于人”的递进。2015 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化解过剩产能、矫正要素配置扭曲[③]；构建新发展格局将扩大内需、畅通国内大循环置于战略位置，服务消费走出“低水平均衡”成为重要议题[④]。在此基础上，“投资于人”作为更加明确的战略指向逐步成形。

这一转向具有清晰的政策标志：2023 年 5 月，党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202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投资于人”，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调结构”转向“以人为本”。

（二）现实逻辑：转向“投资于人”的现实依据

历史逻辑梳理了政策演进的脉络，现实逻辑要回答“投资于人”为何在当下更加紧迫。“投资于人”势在必行，主要源于三重相互交织的现实压力。

直接压力来自传统领域投资收益趋弱。如前文所述，当前资本深化的步伐快于产出增长，城镇住房及部分耐用消费品需求正在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与结构升级，单靠物质资本扩张稳增长的空间不断收窄。更深层的变化在于需求结构本身的转向。2024 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 46.1%，对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63%[⑤]，服务消费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引擎。随着人均 GDP 在 2023 年前后稳定在 1.2 万美元以上、迈入后工业化社会，居民的服务消费、发展型消费、享受型需求快速扩张，但优质供给相对滞后[⑥]。“投资于人”获得具体的现实指向，即扩大并提升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消费供给，将“人”的需求转化为有效增长。

随之叠加的是人口与分配格局的双重约束。人口红利消退使粗放投入式增长难以为继，青年群体的消费偏好与方式日益左右需求结构和产业方向[⑦]。收入分配差距与偏高的预防性储蓄持续压制有效需求[⑧⑨⑩]。在外需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将增长动力重新锚定于内需、锚定于“人”的能力与收入，已经成为现实的必然选择[⑪⑫]。

与此同时，要正视转向面临的现实约束，避免单向乐观。一是部分制造业领域的产能过剩与“内卷式”竞争带来通缩压力，不仅意味着“投资于物”的空间进一步受限，而且揭示了资源转向“投资于人”会在短期内面临一定增长缺口的实际。二

① 王一鸣. 中国经济新一轮动力转换与路径选择[J]. 管理世界，2017(2)：1-14.
② 同①
③ 同①
④ 李勇坚，刘宗豪. 以“投资于人”助力服务消费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逻辑、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J]. 企业经济，2026，45(2)：16-26.
⑤ 同④
⑥ 彭冲，钟辉勇. 消费的生产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J]. 学术月刊，2025，57(2)：56-66.
⑦ 同⑥
⑧ 陈昆亭，周炎. 有限需求、市场约束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20，36(4)：39-53.
⑨ Chamon M D，Prasad E S.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0，2(1)：93-130.
⑩ 陈斌开，陈琳，谭安邦. 理解中国消费不足：基于文献的评述[J]. 世界经济，2014，37(7)：3-22.
⑪ 郭克莎，杨阔. 长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制约：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增长理论与实践分析[J]. 经济研究，2017，52(10)：4-20.
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着力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J]. 党建，2025(12)：33-3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是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土地财政收缩，使“加大教育、医疗、社保投入”面临硬约束，财力薄弱地区尤甚[①]。三是青年消费活力与青年就业压力、收入预期下行并存，对“青年消费拉动创新”的判断必须以稳定就业与收入预期为前提，否则可能使消费意愿被收入约束抵消[②]。这些约束并不否定转向的方向，但决定了转向必须审慎、渐进、因地制宜。

（三）实践逻辑：投资两端再平衡的实践展开

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表明，要在优化物质投资的同时，将更多资源用于人的发展。但再平衡的目标并非压缩“投资于物”，而是强调推动投资两端同步升级、彼此嵌入，这一逻辑已经在近年来的实践中逐步显现。

“投资于人”一端的实践重心落在以教育、医疗、文化为代表的服务消费领域。财政资金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投入，一方面直接积累健康与教育人力资本[③]，另一方面稳定居民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进而释放服务消费能力[④⑤]。从消费的生产性看，教育、医疗、文化等消费的实质是对个人的技能与健康进行投资，可以进入生产函数，为将上述领域作为“投资于人”的抓手提供机制依据[⑥]。青年消费尤其值得关注，其可以从三个方向参与内生增长：青年群体将家政、餐饮等家务外包，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学习与创新，推动劳动力向更高生产率部门流动，由此改善人力资本配置；作为新产品的“首试者”，青年的“尝鲜型消费”为新技术提供应用场景，第三空间消费成为知识传播与创意碰撞的平台，加速技术迭代；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年消费形成的交互数据经合法合规处理后成为企业优化生产、精准匹配供需的重要要素。据此，面向青年完善托育、家政、养老、健康管理等服务供给，优化新型消费环境（含城市更新与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推动文化供给与数据治理协同，构成“投资于人”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需要补充的是，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青年拥有稳定的就业与收入预期；在青年就业承压、收入预期偏弱时，相关政策应优先稳就业、稳预期，再考虑消费驱动[⑦]。

“投资于物”一端应在提高传统投资效率的同时，发展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和先进制造装备。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与闲置空间再利用可以改善居住品质和服务可及性[⑧⑨]。“消费城市”理论认为，宜居与服务条件有助于吸引高技能人口[⑩]，但也可能提升生产率与税基，其效果取决于人口流动和就业机会。新型基础设施能够赋能人的发展：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及先进设备既支撑数字服务，也为研发与技能应用提供技术条件。例如，2025 年，杭州市的“为企办实事”项目将降低企业算力成本与降低职工住宿成本纳入同一政策安排[⑪]。由此可见，算力设施的使用支持与人的生活保障可以协同降低创新成本。这一政策设计揭示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互补性。

投资两端在实践中相互交融。“投资于人”聚焦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消费供给和青年消费培育，“投资于物”通过城市更新、新型基础设施与先进装备提升质量，前者提升人的能力与需求，后者为之提供物质和数字基础。这种“双升级、相嵌入”的格局[⑫⑬]是投资结构再平衡由理念走向落地

① 金殿臣，李媛，陈昕. 财政资金“投资于人”与居民消费：效应与机制[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3（5）：88-97.

② 彭冲，钟辉勇. 消费的生产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J]. 学术月刊，2025，57（2）：56-66.

③ 王弟海. 健康、教育与内生经济增长[J]. 浙江社会科学，2025（2）：20-37.

④ 黄群慧，王岭. 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2025，45（9）：69-81.

⑤ 同①

⑥ 同②

⑦ 同②

⑧ 同②

⑨ 龙少波，张梦雪，田浩. 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J]. 改革，2021（2）：90-105.

⑩ Glaeser E L，Kolko J，Saiz A. Consumer C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1，1（1）：27-50.

⑪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高质量实施 2025 年市政府“为企办实事”项目的通知（杭政办函〔2025〕6 号）[EB/OL]. [2026-08-28]. https://www.hangzhou.gov.cn/art/2025/2/14/art_1229063387_1849481.html.

⑫ 同②

⑬ 同⑨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现实路径，为政策设计提供依据。

五、以“投资于人”推动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发展模式的制度路径

从政策层面看，要围绕“能力与收入—消费—创新—再投入”衔接推进，并明确实施时序。短期重在稳就业、稳预期，对低收入和照护负担较重家庭实施精准支持，优先利用现有设施扩大服务可及性，并评估补贴的新增消费效果与退出条件；中期重在扩大普惠托育、养老和医疗供给，将设施改造、技能实训与运营资金配套，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长期重在持续投入健康、教育、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完善收入分配与央地激励，使生产率收益稳定转化为劳动收入和公共服务。

（一）财政支出结构再平衡

财政支出结构再平衡对应“资源投向人”环节。“重生产，轻消费”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一，财政成为撬动投资结构转向的首要杠杆。改革的关键方向是压减低效产能补贴，增加民生与人的发展投入，同时，保障基础研究、技术改造和必要基础设施支出。有研究发现，在经济结构转型期推动财政政策从支持生产为主转向支持消费为主，有利于缓解供求错配、扩展内需[①]。产业政策应顺应需求结构变化，避免脱离需求与技术条件进行重复扩张[②]。

近年来，我国财政实践正沿着这一方向展开。从2024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到2025年分四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3000亿元，惠及3.6亿人次[③]，这些政策在扩大耐用消费需求、促进产业更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财政促消费不能仅停留在短期补贴和价格刺激上，应更多转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等具有“投资于人”属性的领域，使财政资金既形成当期需求，又积累长期能力。后续政策可以在延续耐用消费品更新支持的同时，逐步提高服务消费、发展型消费和新型消费场景的支持比重。

在财力受限的条件下，更加可行的办法是在既有支出中压减低效的生产性补贴、腾挪空间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并对中西部地区辅以中央转移支付，避免陷入“越该投人、越无力投”困境。同时，可以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投资和消费的关联机制优化政策设计，实现从“一策一目标”向“一策多目标”转变。有研究发现，2008年，我国实施的内资企业工资薪金据实扣除政策能够同时产生激励投资和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④]。

（二）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保障

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对应“降低风险、释放消费能力”环节，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支撑。健康与教育投入直接积累人力资本，社会保障通过稳定预期、分担风险，为能力发展与消费提供条件[⑤]。住房、教育、医疗等私人负担上升推高城镇家庭储蓄，公共服务可以缓解这一约束[⑥]。近年来，发放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提高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完善养老保障等政策正在覆盖生育、养育、教育、医疗和养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后续要高度重视服务实际可及性，统筹安排设施、专业人员与运营经费，避免“建而不用”；要以家庭自付负担、照护时间和服务使用率评价效果而非仅以财政支出规模衡量投入成效。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成为具备供给侧（积累人力资本）和需求侧（释放消费）双重功能的增长性投资。

（三）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

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容对应“形成持续消费能力”环节，是消费拉动内生增长闭环能否良性运转的枢纽。如前文所述，有限需求理论表明，

① 徐朝阳，张斌. 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内需扩展：基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2020(1)：64-83.

② 刘志彪，孙文婷. 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 南京社会科学，2025(9)：30-40.

③ 财政部调研小组. 2025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R/OL]. [2026-08-28]. https://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2603/t20260317_3985436.htm.

④ 李永友，吴云成. 税基型减税政策、投资激励与消费提振——基于工资薪金据实扣除政策的证据[J]. 管理世界，2026，42(6)：1-31.

⑤ 黄群慧，王岭. 以“投资于人”推进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基础理论与根本路径[J]. 江西社会科学，2025，45(9)：69-81.

⑥ Chamon M D，Prasad E S.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10，2(1)：93-130.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压制有效需求与增长动力。有学者将分配与转型中的市场扭曲视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①]。还有学者认为，偏向资本所有者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会削弱“投资—收入—消费”的转化[②]。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劳动者报酬、稳定就业预期不仅仅是共同富裕政策，更是内需主导型增长模式的基础条件。

（四）服务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服务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应“释放发展型消费的生产性”环节。“十五五”期间甚至更长时期，服务消费是扩大内需的主战场，也是供需错配最突出的领域。其中，教育、医疗、文化、养老、健康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消费既是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也是积累人力资本、释放消费生产性的关键领域。

在服务消费端，服务供给不足与居民支付能力约束并存，需求转向服务领域但资源配置调整相对滞后。同时，要正视部分服务业可能面临的“成本病”。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劳动密集且难以用技术替代人力投入的服务部门，其劳动生产率提升通常慢于技术进步较快的制造业；当工资水平随全社会生产率提高而上升时，单位成本和相对价格将趋于上升[③]。这意味着扩大服务消费供给不能仅靠放开准入，而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与组织创新提升服务业生产率，避免服务价格的持续上涨弱化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因此，“投资于人”要满足人的发展型需求。在政策层面，一方面要放宽服务业准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另一方面要顺应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消费。2025 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设立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明确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额度 5000 亿元，为相关经营主体扩大服务供给提供融资支持。新消费由数字技术驱动，呈现主体、领域、技术、模式、关系、制度六个层面的“新”特征[④]；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即生产”的特征要求供给侧主动适配消费升级[⑤]。此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准入与价格管制是改革的“硬骨头”，放开准入须与质量监管、公益属性保障同步推进，避免单纯市场化带来的可及性与公平性损失。

（五）区域协同与城乡融合

区域协同与城乡融合对应“人口 – 服务 – 消费空间匹配”环节，“投资于人”要顺应人口流动规律，服务人口空间布局。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高度依赖空间结构优化和公共服务可及性提升。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并非简单扩大城市建设规模，而是使人口流动、公共服务、消费场景和产业机会在空间上更加匹配。城市更新与服务供给应具有空间针对性。东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与城市群可将新增投入优先用于随迁子女教育、普惠托育、保障性租赁住房及高品质服务供给，缓解生活成本与时间约束；中西部县域和农村应加强中央转移支付，依托基层学校与养老设施，补齐专业人员和运营经费短板；东北及其他人口收缩地区应盘活闲置设施、发展上门与流动服务，避免按增量人口预期重复建设。区域方案应以人口流向、财政能力和服务缺口为依据，而非仅按东中西部划线。

城乡间的消费差距有其历史和制度根源。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既是促进消费公平的需要，也是释放农村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需要。

（六）户籍、土地与转移支付制度的配套

制度配套对应“保障闭环持续运转”环节，其中，户籍、土地和转移支付是关键。2024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约为 67%，户籍城镇化率较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约 17 个百分点[⑥]。大量已经在城镇常住的人口如果不能充分享有与常住地相匹配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服务，其消费能力与人力资本积累都会受到抑制。因此，应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覆盖，完善与人口流动相适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土地、住房和公

① 陈斌开，陈琳，谭安邦. 理解中国消费不足：基于文献的评述[J]. 世界经济，2014，37(7)：3-22.

② 张杰. 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机制：基于“投资–消费”融合理论框架[J]. 学术月刊，2025，57(12)：36-49.

③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3)：415-426.

④ 毛中根，谢迟，叶胥. 新时代中国新消费：理论内涵、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J]. 经济学家，2020(9)：64-74.

⑤ 陆铭.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消费发展趋势[J]. 新金融，2023(11)：7-10.

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着力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J]. 党建，2025(12)：33-3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共服务供给改革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部署需要在财政责任、服务标准和跨地区衔接上进一步落实。与此同时，要正视央地激励张力，部分地方偏好建设周期短、税基易归属本地的项目，教育、健康等投入回报较慢，跨区域外溢较强，只有将长期发展、公共服务和居民福利纳入地方激励体系，“投资于人”闭环机制才能真正落地。

The Mechanism Driven by Domestic Demand，Consump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Economic Structural Rebalancing Driven by “Investment in People”

HUANG Qun-hui[1, 2]　PENG Chong[3]

（1. School 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
2.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45；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 Real Estate，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China’s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trong supply and weak demand，the Outline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advances a macroeconomic governance approach aimed at fostering m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that are led by domestic demand，driven by consumption，and underpinned by endogenous growth.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three concepts in terms of their respective dimensions：market base，demand structure，and sources of growth. Within a framework that coordinates “investment in physical assets” with “investment in people”，the paper takes investment in people as its central analytical thread and develops a feedback loop comprising investment in people，improvements in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consumption expansion and upgrading，demand-induced innovation，productivity gains，and reinvestment in people. It also explains how high-quality investment in things supports this loop through capability formation，employment absorption，and 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a key priority in promoting economic structural rebalancing is to increase both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vestment in people. Development-oriented service consumption has productive attributes and can contribute to endogenous growth through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the release of time，knowledge spillovers，and data generation and accumulation. The viability of this endogenous growth loop further depends on fiscal sustainability，income distribution，and institutional incentive structures.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coordinated reforms are needed in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public services，income distribution，the supply of consumer services，regional coordination，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sustained momentum for domestic demand-led endogenous growth.

Key words: Investment in People；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of Strong-Supply-Weak-Demand；Domestic Demand-Led；Productivity of Consumption；Endogenous Growth

[责任编辑：李　蕾]
[责任校对：王文秋]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本期特色栏目作者

AUTHORS FOR SPECIAL ISSUES



纪亚光，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指委副主任委员、马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主要成员等职。出版学术著作 1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荣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一等奖，专著《战后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荣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文章内容详见第 5—15 页）



洪向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复兴之路》《聚焦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等著作 30 余部。其中，《新时代党的建设丛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在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荣获精品教材奖。发表学术论文、译文 300 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16—24 页）



丁俊萍，武汉大学政党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兼任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工程专家，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主编等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多项。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等奖项。

（文章内容详见第 25—33 页）



黄群慧，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人才工程。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等奖项。

（文章内容详见第 42—55 页）



原新，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养老服务专家库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等职。荣获中华人口奖科学技术奖等奖项，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文章内容详见第 99—109 页）



曹树金，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国际知识组织学会中国分会主席、《图书情报工作》期刊编委等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各级各类课题 30 余项，出版著作 1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230 余篇。

（文章内容详见第 167—176 页）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